

社会办营利医疗机构床位数将自定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 实习记者 文颖)1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出,要取消社会办医疗机构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等审批,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床位数逐步实行自主决定。

自从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以来,国家相继出台多项措施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办医。《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举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等相继发布,一系列旨在加大力度消除社会办医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的措施先后执行。

在业内人士看来,虽然经过一系列改革,我国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可及性显著提升,社会办医加快发展,但是在社会办医服务内容和模式方面仍有待拓展升级,同时存在放宽准入不彻底、扶持政策不完善、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业内表示,本次常务会议提出取消社会办医疗机构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等审批,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床位数逐步实行自主决定,意味着今后对社会办医疗机构将更充分地在准入、执业、监管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一视同仁,有效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向市场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

财政部 1.72万亿地方债务需置换

据新华社电 1月17日财政部对外发布,截至去年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64706亿元,控制在在全国人大批准的188174.3亿元限额之内,其中,有大约1.72万亿元的债务需要置换。

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43581亿元。其中,一般债券23619亿元、专项债券19962亿元;按用途划分,新增债券15898亿元、置换债券27683亿元。这是财政部首次发布全年地方债的细账。

截至2017年12月末,全国地方债余额为164706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03322亿元、专项债务61384亿元;政府债券147448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17258亿元。这意味着,2018年,剩余的大约1.72万亿元债务将需要进行置换。

审计署在2017年底的一份报告中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个别地方政府存在通过融资平台公司、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风险不容忽视。

这份报告进一步指出,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的主要原因包括领导干部政绩观不正确、项目实施责任不落实、一些金融机构推波助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问责不到位等。

农业部 农业生产成本将快速上涨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 张畅)1月17日,农业部举行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发布会。会上,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唐珂表示,因供应不足,近期化肥价格可能出现快速上涨,而原材料、能源价格的上涨也会推动农药、农机作业成本上涨,叠加环境生态成本逐步显现,预计我国农业生产成本将结束近两年相对平稳的态势,今年或重回较快上涨通道。

近年来,随着农产品金融属性的增强和农业产业化的提升,外部因素对农业影响不断加深。唐珂表示,去年9月以来,我国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都先后出现了上涨行情,其中尿素涨幅较大。这一轮化肥价格上涨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即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化肥企业开工率有所降低。如果后期化肥生产企业开工率仍不能明显提升,今年春耕期间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供应紧张,价格快速上涨。

相关数据显示,近几个月来,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等均出现大幅上涨,有些品种涨幅已经超过20%。煤炭、硫磺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也导致氮、磷、钾等化肥原料生产企业的成本增高,而国际化肥价格上涨也对国内化肥价格有所支撑。

环保部 排污许可证制度将全面推开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1月17日,环保部发布了《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并对该政策进行了解读。据介绍,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各地陆续试点实施了排污许可证制度,至今已有28个省市区出台了相关政策,累计向24万家排污单位发放了排污许可证。201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正式启动国家层面的排污许可证制度,在全国火电、造纸行业进行试点。而本次《办法》将建议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制度,要求排污单位必须持证排污。

据悉,《办法》规定,排污证主要内容包括承诺书、基本信息、登记信息和许可事项,排污单位“持证”可排污量、浓度等由核发环保部门确定。而且,地方政府依法制定的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重污染天气应对措施要求排污单位执行更加严格的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应当在排污许可证副本中规定。通过排污许可证,环保部对企业的环境监管逐步从企业细化深入到管每个具体排放口,从主要管4项污染物转向多污染物协同管控,从以污染物浓度管控为主转向污染物浓度与排污总量双管控,特别针对当前雾霾防治,在排污许可证中增设重污染天气期间等特殊时段对排污单位排污行为的管控要求,将排污许可和环境质量改善要求密切挂钩,推动固定污染源的精细化管理。”环保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三年万亿 央企负债从哪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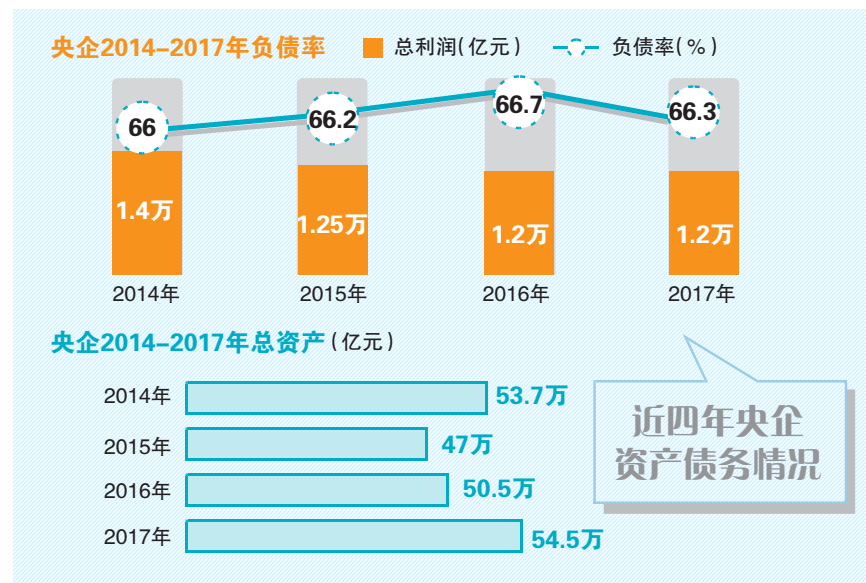
1月17日,国新办召开2017年中央企业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会上,国务院国资委总会计师沈莹披露,去年98家中央企业利润首破1.4万亿元,而在负债方面,截至去年底央企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6.3%,同比下降0.4%,其中62家企业资产负债率比上年下降。沈莹介绍,根据部署,到2020年前央企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要再下降2个百分点。北京商报记者根据去年底央企545万亿元的资产总额测算,要实现2%的降幅,未来三年内,央企负债将至少下降1.09万亿元。为此,国务院国资委还以工业企业、非工业企业和科研设计企业为标准分别制定了三类央企的负债红线。

分类划定负债红线

“为了严控央企负债率,国务院国资委确定了一个能够保证企业稳健发展的合理资产负债率控制标准”,沈莹介绍,这个标准分成三大类,工业企业为70%、非工业企业为75%、科研设计企业为65%。据介绍,国务院国资委还以警戒线和偿债能力为依据,对98家央企进行业务分类,将超过警戒线、偿债能力比较弱的企业纳入重点管控,纳入重点管控的企业又进行分类管控,分成三大类,并对这三类企业采取不同程度的管控措施,从严格控制开支规模、投资规模、薪酬等。

沈莹表示,近几年央企投资规模较大,是形成高杠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国务院国资委将把控制投资规模作为重要的管控措施,首先要严禁高负债企业的非主业投资,同时严控低效业务、偏离主业业务,尤其是一些超越财务承受能力的投资。此外,考虑到负债率较高的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国务院国资委要求高负债央企严控存在风险的业务,包括大幅压缩应收账款、存货,严控对外担保、委托贷款等。”沈莹表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央企‘抱团出海’在境外投资,这本是益事,但部分央企却热衷于投资表面高利润的境



外文化、体育行业,却忽略了自身不具备相应的风险管控能力,必然潜藏较高的投资风险”,国资专家、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波善表示。

在祝波善看来,我国之所以提出要分行业设置企业的负债率,正是因为各行各业情况不同,分行业设置将更有利于企业发展。例如房地产业属于资本扩张型行业,负债率相对较高,工业型企业的负债率基本偏低,二者难以统一标准,还有一些钢铁、煤炭领域的僵尸企业依靠负债存活,也不能将这些企业和资本扩张型行业混为一谈,应当分开设置警戒线”,祝波善表示。

工业央企负债率最高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我国部分央企的负债情况颇为严峻。去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就公开点名了两家负债率为85%以上的央企——中国铁物和中钢集团,并直指两家企业都是靠钢铁业务虚增规模,引发债务风险;以装备制造等为主业的部分工业央企,由于产业资金回笼时间长、部分产品投资回报率不高,需要大量借贷维持正常运转,从而推高了资产负债率,成为近百家中企中负债率最高

的类别”,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锦告诉记者。

以中钢集团为例,据国资委统计,截至2014年12月,中钢集团及所属72家子公司债务逾1000多亿元,其中金融机构债务近750亿元,牵涉境内外80多家银行,还有一些信托、金融租赁公司。而综合中钢集团旗下两家上市公司中钢国际、中钢天源相关公告等信息可知,截至2016年,中钢集团资产负债率已连续五年超过90%。有业内人士指出,中钢集团陷入积重难返的境地,与此前盲目扩张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滑紧密相关。中国铁物的日子也不好过。据2016年中国铁物IPO财务分析表披露,截至当年3月底,中国铁物资产负债率高达88.93%。国务院国资委曾披露,2009-2013年,中国铁物盲目追求规模扩张,违规开展大量钢材、铁矿石、煤炭等大宗商品融资性贸易,直接推高了债务风险,且偿付能力严重不足。

中国人民大学此前发布报告指出,从我国国企的负债结构看,债务来源主要有三方面,即银行传统信贷、金融市场债务工具发行以及类“影子银行”的信用融资。李锦也指出,除了拆

解等之外,央企负债体现形式还有企业间交易产生的债务,其中银行贷款为负债的主要体现形式。

债转股或成破题之策

鉴于多数央企负债率较高的形势,近几年推动央企去杠杆、去负债已然成为国资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指出,要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肖亚庆也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去杠杆、降低债务是央企今后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目前央企总体债务风险是安全、可控的。

“目前来看,央企去杠杆进展基本符合政策预期”,国务院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指出,而未来三年降低万亿元债务的目标,将主要由当前负债率较高的行业贡献。李锦也认为,不同类型企业间降低负债率的难度也不尽相同;“重化工业,包括煤炭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等,降低负债率的难度较大,而新兴产业则难度较小”。

还有业内人士认为,债转股将成为不少央企降低债务的重要手段。此前就有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披露,作为“去杠杆”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化债转股正在提速,多家国企与银行密集签约债转股协议。实际上,2014年曾被传濒临破产的中钢集团,当时正是在国务院国资委、银监会等部门的组织下,与几十家银行谈成减债、展期、债转股等条款,改善了债务情况,其中债转股的比例大约占到一半。

针对三年降低万亿元规模的债务,李锦的信心较为充足,他表示,负债率能否降低关键在于央企发展思路能否改变,如果部分央企仍坚持以投资为主,还清巨额债务的难度依旧较大;“央企投资不能只为寻求刺激,要有质量地提升GDP”。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张畅 实习记者 于怡文 代小杰/制图

T 今日评 Today's review

2018,将改革进行到底

韩哲

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2017年GDP等经济数据。而稍早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经“剧透”,2017年GDP预计增长6.9%左右。

相比2016年GDP增速6.7%,中国经济回暖无疑。这个结果超出市场预期,因为楼市调控和金融去杠杆让经济承压,但中国经济最终扛住压力,不仅实现了软着陆,也实现了稳增长。只不过人们对于是否走出“L型”底部仍有所保留,对底部时间莫衷一是。

增长翻红自然也让改革有了底气。过去一年,楼市调控丝毫不松口,金融整顿丝毫不手软,改革效果有目共睹。与此同时,随着GDP增长目标的淡化,一些省份也开始主动挤水分,而这肯定得到了中央的认可。比如,内蒙古调减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2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40%,天津滨海新区则将2016年GDP调减了1/3。辽宁也承认所辖市县在2011-2014年存在财政数据造假。地方

GDP挤水分,事实上与楼市调控和金融整顿同属一个逻辑,就是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就是去杠杆的不同表现形式。

不过,2018年经济增速回落是个大概率事件,因为2017年的增长就已呈现出高开低走的走势,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放缓,民资也始终在低位徘徊。因此,尽管2017年中国经济交出的一份不错的成绩单,但2018年难以判断。一方面,消费和出口不会大幅增长,而作为投资“三驾马车”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也面临或周期性或政策性的掣肘,以及财政的约束,很难脱颖而出;另一方面,积极财政的大方针不会变,政策支持力度不会减,因此投资还是会获得强力背书的,不会任其摇摆。

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因此2018年的经济增速高还是低,并不是我们的核心目标。我们最关心的是供给侧

和新经济。之于前者,能否进一步盘活存量,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权力放进制度笼子;能否进一步减税降费,减少寻租空间,减少行政干预;能否进一步打开市场,向民资和外资开放服务业,将决定着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厚度和韧性,将决定着中国经济能否市场出清,走进新周期。之于后者,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新消费,能否交叉、融合成为一个新经济的生态系统,能否推动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和服务升级,将决定着中国经济能否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将决定着中国经济能否跑赢泡沫,能否为诸多改革留出足够空间腾挪。

如果不出意料,2017年中国GDP将站上80万亿元的台阶,而如果我们保持定力,保持稳定,到第一个百年时,中国GDP将突破100万亿元,这将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历史性成就。而从今年开始,这个窗口已经打开,无他,将改革进行到底。

北京将划定养老服务机构财政支持界限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财政部用于支持养老机构的这笔账将更加清晰地呈现在北京的企业和居民面前。在1月17日的“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北京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新闻系列发布会上,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介绍,截至去年底,北京已建成社区养老服务驿站380个,培育养老服务商超过1.5万家。会后,李红兵进一步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今年,驿站等养老服务机构如何实现可持续运营、真正按市场化方式操作将成为民政工作重点。2018年,北京将出台政策明确对养老服务机构的财政支持界限。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北京全市16区已建成并运营了16家区级养老

服务指导中心,正在建设中的共9家,完成选址并在完善建设方案1家,同时,北京全市共建设了252个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此外,北京还将在各区域形成就近区域养老服务联合体。

而对于近年来北京开始兴建的养老服务驿站,李红兵介绍,目前北京已交付运营的380家驿站中有150家是2016年完成的,而去年交付运营的有230家;对于已经开始运营的每家驿站,政府都出资了20万元来购买服务,用于为驿站周边社区的失能、失智、高龄独居老年人,以及家中有残疾子女等残疾人的老年人和困境儿童提供支持性、专业性的服务”。李红兵表示,今年,北京将出台相应政策划定养老驿站、养老照料中心等养老服务机构的

财政支持界限,原来政府补贴不规范、不明确的问题将得到解决和改善,需要政府“买单”的基本公共服务,比如场地租金、水电取暖等都会纳入财政支持范围;与此同时,政府还会出资购买部分服务,让运营商可以以“折扣价”给出“原价”的服务,而且不会因此在经营上受到损失。

有养老驿站运营商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其实近两年,北京及各区都确定了对驿站等养老服务机构的补贴等各种资金支持措施;以养老驿站为例,按照规定,通常每家驿站的一次性建设补贴在30万-50万元不等,并且,从去年起驿站还会拿到相应金额的运营补贴”。该负责人表示,此外,市级层面及各区都会以各种方式向驿站运营商购

买服务,比如东城区会每个月为运营商支付300-500元/人不等的费用,用于为驿站周边覆盖区内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等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服务。

“不过,目前各区对于北京市的补贴政策具体落实方式、力度等截然不同,各种相关手续办理也存在较大差异,真正运营商在各区能拿到的资金支持大相径庭。”上述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有的区对于驿站申请补贴的要求十分严格,只有民营非营利机构才有资格申请;有的区建设补贴不一定能完全足额发放;有的区虽然承诺可以免费提供驿站场地,但如果没有相应资源的情况下,运营商租下场地后,相关部门并不会帮助承担租金等成本。